

中国典籍名篇分类精译

辩说名篇

刘浦江 张文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辯 說 名 篇

刘浦江 张 文 编译

王子今 审定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 173 号

中国典籍名篇分类精译

辨 说 名 篇

刘浦江 张 文 编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大兴包头营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本开 9.25 印张 221 千字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2000 册

ISBN 7-80049-822-0/G·304 定价：6.40 元

《中国典籍名篇分类精译》编译说明

让更多的人比较容易地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我们从中国历代典籍中精心选择了一批有代表性，并对当代人有较大借鉴意义的篇章，译成白话，分类成册，奉献给广大读者。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本套书，特作如下说明：

一、全套书由《治国名篇》、《兵书名篇》、《修身名篇》、《治家名篇》、《治学名篇》、《辩说名篇》六册组成，每册围绕一个主题选译了若干篇章。为了便于读者通过一本书能较为系统地了解一个主题，尽管各册所选的篇目略有重复，但其内容则不同。

二、因篇幅所限，本书只收译文，未录原文。翻译时所依据的原文尽量采用中华书局的标点本。如无中华标点本，则尽量采用经过点校的通行本。

三、为了节省篇幅，对一些篇章作了删节。凡是作过删节的，均在该篇题目上标明“节录”二字。

四、各篇顺序均按该书作者生活的年代，或成书年代排列。每篇译文之后，附有简短的注释和题解，扼要说明该书和作者的简况，介绍该篇所论述的主要问题或观点。

五、译文分段基本上按照底本。若底本未分段，或明显分的不合理，则重新分段。书名、篇名和小标题名均不翻译，仍用原文，以便于读者查找原书。

六、鉴于古籍体例不一，各篇题解的写法也略有不同。

(一)有的著作各篇篇幅很短，实际上是带标题的段落，则将其视为一篇，在译完所有段落之后作总的题解。

(二)有的著作未分篇，只分卷，则译完所选各卷之后作总的题解。

(三)有的著作原篇篇幅不短，但由于各册主题所限，选的段落过于短小零碎，按篇撰写题解不容易概括主题，则采取合并各篇写一总题解的办法。

(四)有的著作原有题解，为避免混乱，在原书题解前加“原书”二字，对其各篇不再另作题解，而是在译完各篇之后作一总题解。

七、注释力求简明扼要。一般只注重要的，或常用工具书不易查找的人名、地名和典章制度名。目的是帮助读者理解原文，所以不作考证。凡是不影响读者理解的原文，一律不加注释。

八、为了便于读者从目录上了解全书的内容，我们在目录上标明了各篇的原作者姓名。对那些目前尚无定论的，则采取通常的说法。

本套书由柯蒙主编。主持各分册编译工作的是：

《治国名篇》：萧少秋

《兵书名篇》：李 军

《修身名篇》：王子今

《治家名篇》：宋小庆

《治学名篇》：周溯源

《辩说名篇》：刘浦江

参加本书编译工作的有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求是》杂志社、总参谋部、北京大学等单位的专业理论工作者。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编译中难免会有不当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岳中同志曾给本套书提出了一些建议，在此特致谢意。

编 者

1992年8月1日

前 言

在中国历史上,论辩方法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作为一种应用方法,它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趋于成熟。本书主要从先秦秦汉时期的各种典籍中,选译了有关论辩方法及论辩实例的论著共五十余篇,大致可以把它们分为游说术、应对术和进谏术这样三类。

游说术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当时诸侯林立,群雄纷争,各国为了求生存、拓疆土,明争暗斗,相互倾轧,于是善机变之谋的策士便应运而生。策士是当时社会生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他们活跃于各国的政治舞台上,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滕文公下》)的政治能量。尤其到了战国中后期,策士们为了适应当时各国间政治斗争的需要,或主合纵,或主连横;或奔走游说,或入朝干政,形成了一批所谓的纵横家。纵横家的说辞集中地保存于《战国策》一书中,此外如《韩非子》中的《初见秦》、《存韩》,《庄子》中的《说剑》等,也都是典型的纵横家言。纵横家在当时是一群有文化、有知识的“智囊”人物,是策士中的佼佼者。《玉篇》对“士”作过这样的诠释:“传曰:通古今,辩然不(否),谓之士。”战国时代的纵横之士,确实称得上是博通古今的,他们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各国的政治、经济、地理状况,风俗、民情乃至国君的志趣、爱好,都了如指掌。纵横家崇尚智谋策略,奉行策略至上的

政治主张。如果说儒家主张“以德服人”，法家主张“以力服人”，那么纵横家则是主张“以智（谋）服人”的，亦即《战国策》所谓的“战胜于朝廷”。要想使自己的计谋为君主所采纳，主要便是依靠游说。纵横家非常讲究游说的技巧，《战国策·秦策一》记苏秦游说秦王不成，归而发愤攻读，简练揣摩，期年而成。于是说赵王合纵以抑强秦，深得赵王赏识，被封为武安君。当然，尚游说不仅仅是纵横家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无不讲究游说之术，孟子尽管攻击“处士横议”，声称“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孟子·尽心上》），但他自己却也辗转于各诸侯国之间，多方兜售他的政治主张，只是由于他的仁义之道过于迂阔，被各国君主认为不合时宜，因而未受信用罢了。《韩非子》中的《说林》、《内储说》、《外储说》等篇章，也都不外乎是游说的研习和说资的积累。游说是诸子百家的共同志趣，只不过在专以纵横捭阖之博取功名的纵横家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罢了。由于游说之风盛极一时，至战国后期，便出现了像《吕氏春秋》中的《顺说》、《开春》及《韩非子》中的《说难》这样一些专门对游说之术进行经验的总结和理论的概括的论著。汉代刘向《说苑》中的《善说篇》，更是专门总结游说技巧的一篇集大成的专著。

在春秋战国时期那种“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游说术，随着封建大一统国家的出现和思想文化专制的加强，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秦末汉初，楚汉相争之际，尚有蒯通、陆贾等一二策士，承纵横家之余绪，奔走游说于群雄之间。但自统一王朝再建，儒学取得正统地位之后，春秋战国以来那种“朝秦暮楚”的策士作风、“论行结交”的君臣关系，终为一种新的道德人伦所规范，于是曾一度堪称“显学”的游说术便渐渐销声匿迹了。

应对术也是春秋战国时期策士们潜心研习的一门学问。春秋

时，各国交际频繁，行人奉使，折冲樽俎，其外交辞令大抵取资于《诗》三百篇，故孔子曾说：“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策士奔走游说、应对辩难，熟读《诗经》乃是一门基本功，以致孔子有“不学诗，无以言”的说法。当时各国的政治斗争多半是在外交场合进行的，一言之得失，往往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应对术就格外为人重视。《左传》、《战国策》都对深谙外交之道，能辩善对，不辱使命的辩士推崇备至。而当时的许多政治人物也都以巧于应对著称，如齐景公时的国相晏婴，便以他机智善辩、应付裕如的外交才能为人们所熟知。比起游说术来，应对术要求有更机敏的反应力。为了研习揣摩的需要，对应对之术进行经验的总结也是必要的，像《吕氏春秋》的《应言》、《审应》及《说苑·奉使》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如果说游说术和应对术都只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为人们所热衷和讲究的话，那么进谏这门艺术则是君臣关系中一个恒久的课题。在先秦时代，进谏和游说有时很难区分，因为当时的君臣关系常常是不固定的。游说和进谏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赤裸裸的商业投机行为，而后者则是以忠君为前提的。对于抱着各种功利目的的策士们来说，自然谈不上进谏，但在当时，即便是专事一主的臣子，他们的进谏也往往掺杂着游说的味道。《战国策·齐策一》记载的邹忌讽齐王纳谏和《赵策四》所载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被后人奉为人臣进谏的范例，但在邹忌和触龙的谏言中，游说的意味也是很浓的。虽然《吕氏春秋》中的《贵直》、《直谏》等篇都十分崇尚直谏，但总的来说，当时对臣子进谏的“忠”和“直”的要求并不高。与后代相比，春秋战国时代的进谏是最讲究技巧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是受了游说之风的影响，邹忌和触龙就是两个最好的例子。

最早对进谏术进行系统总结和理论归纳的是刘向的《说苑·正谏》，刘向十分强调进谏技巧，尤其注重进谏的效果。他把进谏分为正谏、降谏、忠谏、戇谏、讽谏五种。在这几种进谏方式中，所谓的“讽谏”可以说是最讲究进谏技巧的了，刘向借孔子的一句话“吾其从讽谏乎”来表达了他自己对讽谏的偏爱，而在他罗列的历代臣子进谏的范例中，确也以讽谏的例子居多。西汉时期，讽谏亦曾风行一时，即如《子虚》、《上林》等洋洋大赋，也都号称是讽谏之作。对于忠谏和戇谏，作者则显然是持一种不赞成的态度。刘向反对臣子宁死固谏，主张“三谏而不用则去”，因此谏君而“不以危身”就最合乎于他的理想。这和秦汉以后历代封建社会一贯奉行的忠臣准则是大相径庭的。比较一下《贞观政要·直谏篇》所推崇的那种以死相谏的忠臣作为，便可以看出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君臣关系演变的大致轨迹。唐宋以后，臣子进谏虽仍需讲究方式方法，但总的来看，对技巧的讲求已经退到了很次要的地位，因此就进谏术而言，至《贞观政要》就可以概乎观止了。

编译者

1992年7月

目 录

墨 翟：《墨子·非攻》	(1)
墨 翟：《墨子·公输》	(12)
孟 轲：《孟子·公孙丑下》(节录)	(15)
孟 轲：《孟子·滕文公上》(节录)	(17)
孟 轲：《孟子·告子上》(节录)	(22)
孟 轲：《孟子·告子下》(节录)	(24)
庄 周：《庄子·齐物论》(节录)	(26)
庄 周：《庄子·养生主》(节录)	(30)
庄 周：《庄子·秋水》(节录)	(32)
庄 周：《庄子·知北游》(节录)	(33)
庄 周：《庄子·徐无鬼》(节录)	(35)
庄 周：《庄子·盗跖》(节录)	(39)
庄 周：《庄子·说剑》	(45)
佚 名：《列子·天瑞》(节录)	(49)
佚 名：《列子·说符》(节录)	(53)
公孙龙：《公孙龙子·白马论》	(55)
晏 婴：《晏子春秋·内篇谏上》(节录)	(58)
晏 婴：《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节录)	(60)
佚 名：《战国策·苏秦始将连横》	(63)
佚 名：《战国策·张仪说秦王》	(68)
佚 名：《战国策·中期谏秦昭王》	(74)
佚 名：《战国策·邹忌讽齐王纳谏》	(76)

佚 名：	《战国策·齐宣王见颜蜀》	(78)
佚 名：	《战国策·苏秦说齐闵王》	(82)
佚 名：	《战国策·庄辛说楚襄王》	(90)
佚 名：	《战国策·赵武灵王论胡服骑射》	(93)
佚 名：	《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	(100)
荀 况：	《荀子·非相》(节录)	(103)
韩 非：	《韩非子·存韩》	(107)
韩 非：	《韩非子·难言》	(113)
韩 非：	《韩非子·说难》	(116)
韩 非：	《韩非子·难一》	(121)
韩 非：	《韩非子·难二》	(132)
韩 非：	《韩非子·难三》	(140)
韩 非：	《韩非子·难四》	(152)
韩 非：	《韩非子·问辩》	(159)
吕不韦：	《吕氏春秋·顺说》	(161)
吕不韦：	《吕氏春秋·正名》	(164)
吕不韦：	《吕氏春秋·审应》	(167)
吕不韦：	《吕氏春秋·重言》	(171)
吕不韦：	《吕氏春秋·离谓》	(174)
吕不韦：	《吕氏春秋·淫辞》	(177)
吕不韦：	《吕氏春秋·不屈》	(180)
吕不韦：	《吕氏春秋·应言》	(184)
吕不韦：	《吕氏春秋·达郁》	(188)
吕不韦：	《吕氏春秋·开春》	(191)
吕不韦：	《吕氏春秋·贵直》	(194)
吕不韦：	《吕氏春秋·直谏》	(197)
桓 宽：	《盐铁论·本议》	(199)
刘 向：	《说苑·正谏》	(205)
刘 向：	《说苑·善说》	(224)
刘 向：	《说苑·奉使》	(242)

吴兢：	《贞观政要·求谏》		(256)
吴兢：	《贞观政要·纳谏》		(263)
吴兢：	《贞观政要·直谏》		(270)
吴兢：	《贞观政要·慎言语》		(282)

墨翟：《墨子·非攻》

上 篇

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进入别人的果园，偷别人的桃子、李子，大家听说了都会责怪他，官府官员也会因此处罚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损人利己。而那些偷别人狗、猪、鸡的，他们的罪过比这偷别人桃子、李子的更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别人损害得更厉害，他们更加不道德，罪过更大。那些进入别人的栏厩，去偷别人牛马的人，他们的不仁之心比那些偷别人狗、猪、鸡的更厉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别人的损害极为严重，对别人的损害越严重，他的道德也就越败坏，罪过也越大。那些杀害无辜，抢去别人的衣物，夺取别人的戈、剑的人，他们的不义又比进入别人栏厩去偷牛马的人大多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别人的伤害更厉害。对人伤害愈厉害，他们的道德越败坏，罪过也越大。对于这些行为，天下的君子都懂得加以谴责，指责这些人的不义。可如今对于攻打别人国家这么大的事，人们却不懂得去谴责，反而纵容、赞扬这种行为，称赞它是义举。这能说是明白义与不义之间的区别吗？

杀了一个人，别人都要谴责这行为的不义，杀人的人必定要被判死罪，如果根据这种道理类推，杀了十个人就负有十重不义，一定要被判十重死罪；杀一百个人就负有百重不义，一定要

被判一百重死罪。对此，天下君子都懂得加以谴责，指责这种罪行的不义。可是对于如今要攻打别人国家这样大的不义。人们却不懂得去谴责，反而加以纵容、赞扬，说这是义举。由于不明白这种行为是不义的，所以还把这种事记载下来，传给后代。如果明白这种行为的不义，还怎么会把这种事记载下来传给后代呢？现在这里有这么一个人，见黑的见得少，知道黑的是黑的，见黑的见多了，就把黑的说成是白的，人们一定会说这个人分辨不出黑白；一个人苦味尝得少，知道说苦的是苦的，可吃苦吃多了，就说苦的是甜的，人们一定会说这个人分辨不出苦和甜。如今人们对于小的不义，知道加以谴责，而对于去攻打别人国家这样大的不义，就不懂得应该加以谴责，反而去纵容、赞扬，说它是义举。这能说是懂得义与不义之间的区别吗？由此可知，天下的君子对于义与不义的辨别是多么混乱啊。

中 篇

墨子说：“如今执掌国家政治的王公大臣，总是希望奖誉慎重，赏罚得当，施刑没有过失。”

所以墨子说：“古人说过：‘如果遇事想不出办法，就应当凭以往的经验来推测未来，根据已知的条件去推断未知的道理。’这么考虑问题，就能够找到办法。如今军队要出征，冬天行军只怕太寒冷，夏天行军只怕太炎热，所以冬天夏天行军打仗都不适宜。春季兴兵就会耽误百姓耕田种庄稼，秋季兴兵就会耽误百姓收获。如今假如荒废一个季节，就会使难以胜数的百姓饿死、冻死。让我们试着计算一下军队出征所需要的花费：竹箭羽旄、帷幕军帐、铠甲、盾牌、刀把经过使用而破烂不堪难以收回的不胜其数；还有矛戟、戈剑、兵车经过使用而损坏、残破不堪的也不

胜其数，肥壮的牛马经过战争，回来时变得瘦弱，甚至死了再不能回来的也不胜其数；由于路途遥远，粮食运不去而断粮，因饥饿而死的百姓也不胜其数；由于生活不安定，吃饭不能按时，饥一顿、饱一顿，百姓因患疾病而死的，也不胜其数；战死的士卒不可胜数，全军覆没的军队也不可胜数，由此因为祭祀的人已死于战争而再享用不到供品的鬼神也不胜其数。”

国君不治理自己的国家，而是夺取百姓的财用，损害百姓的利益，像这样的情况太多了，可是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国君或许会说：“我是为了博得战胜的威名，并想从战争中取得利益，所以才这么做。”墨子说：“想一想那战胜的虚名，实际上是什么用也没有。算一算自己从战争中取得的利益，反倒不如在战争中所丧失的多。如今就算是攻一个三里方圆的城，七里方圆的郭，很少不用兵刃、不用杀人就能攻取的。如果要杀人，多则几万，少则几千，然后才能攻占这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如今的万乘之国，荒废的城邑上千，人们住都住不过来；土地绵延几万里，开垦都开垦不完。可见多余的是土地，而不足的是百姓。如今却还要让百姓都死于战争，加重国家上下面临的灾祸，来与人争夺荒城，这是不顾自己的不足，而再去增加自己本来已经多余的东西。这么来治国，是没有抓住国家的当务之急。”

替攻战辩解的人说：“南方楚国、吴国的君主，北方齐国、晋国的君主，在刚开始接受天子封号的时候，他们国土的面积，方圆不过百里；人口之多也不过几十万。由于战争的缘故，使土地扩大到方圆几千里，使人口增加到几百万。所以还是应当打仗，而不能停战。”墨子说：“虽然有四五个国家从战争中取得了利益，可是靠战争使国家富强却并不是普遍行得通的道理。这好比是医生给有病的人吃药一样。如今这里有个医生，为天下所有的病人祈祷开药，有一万个人吃了这种药，如果只有四五个治好了病，

那么这种药还不算是普遍适用的药。因而孝子不把这种药拿给父母吃，忠臣不把这种药拿给君王吃。古代天下的封国，无论是过去听说过的，还是如今看到的，由于参加战争导致灭亡的，不可胜数。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东方有个莒国，国家很小，夹在大国之间，它对四邻的大国不恭敬，周围的大国也不肯容忍迁就它。所以东边的越国来侵占它的土地，西边的齐国也在兼并它的土地，如此看来，莒之所以遭到越、齐的瓜分而灭亡，是由于战争的缘故。此外南方的陈、蔡之所以被吴、越灭亡，也是因为战争；北方的不屠何之所以被燕、代、胡、貉灭亡，也是因为战争。”因而墨子说：“如今的王公大臣，如果真是只要得到利益而不想失去利益，只想享有平安而不想去冒危险的话，就必须反对战争。”

为攻战辩解的人说：“这些灭亡了的国家是因为没有大量动用百姓从军，所以才灭亡的。我们能够大量征用百姓从军，靠着这样强大的军队在天下作战，有谁敢不向我国臣服呢？”墨子说：“你虽说能大量征用百姓从军，可是你又怎能比得上吴国的阖闾呢？阖闾花费七年时间训练他的军队，士卒们训练时身穿铠甲，手执兵器，奔跑行军三百里才停下休息。在攻打楚国的时候，吴军驻扎在注林，从冥隘的小路出兵，与楚军在柏举交战，占领了楚国都城，使宋国、鲁国前来朝拜。到了夫差即位后，吴国向北攻打齐国，在汶上扎下营，和齐军在艾陵交战，打得齐军大败，迫使他们退守泰山；向东攻打越国，渡过三江五湖，使越军退守会稽山，从而使东方各国无不向吴臣服。由于夫差在退兵之后没有抚恤战死将士的遗孤，施舍广大百姓，而是倚仗权势，居功自傲，自作聪明，荒废了军队的训练。还兴建姑苏三台，一直修了七年也没有完工。到了这时，吴国上下都有了背弃和厌倦之心。越王勾践看到吴国上下离心离德，便扩充军队，准备复仇。越国的军

队先是攻入吴国都城的北郭，拖走了吴国的大船，包围了吴国的王宫，吴国从此灭亡了。过去晋国有六位将军，其中智伯最为强大。他想凭借自己地广人多，来同诸侯抗争，以赢得英名。他发动的战争进行得很迅速，他按照不同的等级组织将士，动用了许多车船，用来攻打中行氏并把中行氏兼并了。智伯的这个欲望得到满足之后，又去攻打范氏，把范氏打得大败。智伯吞并了中行氏和范氏之后，还不肯罢休，又在晋阳包围了赵襄子。到这时，韩、魏两家聚在一起谋划说：‘古语说，唇亡则齿寒。赵氏早上灭亡，晚上就轮到咱们了；赵氏晚上灭亡，第二天早上就轮到咱们了。’《诗》中说：‘鱼在水中时不快游，等被抓到陆地上后悔就来不及了。’由此韩、魏、赵三家齐心协力，打开城门，开凿道路，武装好军队，共同起兵，韩、魏两家从外面包围，赵在里面呼应，打得智伯大败。”

所以墨子说：“古代有句话说：‘君子不用水做镜子而用人来做镜子。用水做镜子，只能照见自己的面容，用人做镜子，才能推测自己的吉凶’。如今那些要通过攻战获取利益的人，是不是也应当从智伯的事例中得到借鉴呢？智伯行为的结果不是吉而是凶，已经很清楚了。”

下 篇

墨子说：“天下善于赞誉义举的人，他的主张是怎么样的呢？是上符合上天的利益，中符合神鬼的利益，下符合人的利益才去赞誉它吗？还是上不符合上天的利益，中不符合神鬼的利益，下不符合人的利益才去赞誉它呢？即使是最愚昧的人，也一定会说：‘要上符合上天的利益，中符合鬼神的利益，下符合人的利益，才能赞誉它。天下人都一致认为最符合道义的是圣王之法，